

执 笔

第一章	张守一	葛新权
第二章	钟学义	
第三章	刘宝光	
第四章	刘宝光	林 寅
第五章	林 寅	袁相南
第六章	齐舒畅	朱小娟
第七章	林 寅	岳国强 刘厚甫
第八章	刘厚甫	岳国强 林 寅
第九章	韩立岩	
第十章	林 寅	朱小娟
第十一章	马立平	
第十二章	刘厚甫	刘 娟
第十三章	林 寅	

课题组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丽娟	马立平	王汉新	朱小娟	刘 娟
刘宝光	刘厚甫	齐舒畅	李 强	谷治安
林 寅	岳国强	张守一	钟学义	韩立岩
袁相南	戚少成	葛新权	谢 方	魏紫銮

序　　言

我很高兴地看到由林寅教授主编、集体写作的《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产业结构》一书的出版。这本书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再加工而完成的一本学术专著。全书的重点集中于对未来 15 年中国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分析和预测上。今后 15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我国将以崭新的姿态跨入 21 世纪，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对未来的 15 年的研究，是摆在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本书正是众多这类研究成果中的一本有代表性的专著。

本书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我国产业结构历史演变和现状的实证分析。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研究已经有许多成果，那些研究成果中有的是按五年计划划分进行研究，也有的是按经济周期波动划分研究。本书则是按经济机制划分来研究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问题，其中包括：(1)计划机制条件下的产业结构演变；(2)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条件下的产业结构演变；(3)向市场机制过渡时期的产业结构演变。在每一时期中都从为什么要作那样的战略选择；机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结构是如何变动的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这样的分析是很有新意的。这一部分的另一内容是应用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建立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中国经济在 80 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增长源。实证分析表明，80 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投入的增长支

持的；但不容忽视的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是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82年、1987年和1992年投入产出表，对同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因作了探讨，确定了我国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化是由于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变化引起的，表明在该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对分析产业结构的定量分析方法的详细论述，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中有许多创新。本书所使用的产业结构定量分析模型是在1986～1987年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与国家信息中心三个单位同时应用大道模型研究产业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是首创应用投入产出普查资料研制投资系数矩阵，这种研制投资系数矩阵的方法不仅可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而且已经形成一套规范的程序。这一成果对提高应用投入产出技术分析经济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有重要的意义和推广价值。二是首次计算出中国大道模型的影子价格并阐明其经济意义，填补了我国这一应用研究的空白。三是对大道模型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而严格的论证，并对基本理论作了重要推广。目前国内内外所论述的大道模型的基本理论都是在“线性模型”的范围内论证的，但是实际的经济系统往往都是非线性的。本书将线性模型中的大道理论推广到“非线性模型”的范围内，严格证明了在非线性模型中同样存在“大道”性质。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对1996～20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变化的分析与预测，是本书的核心内容。本书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所作的分析与预测，得出的结论是：1996～2010年将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一增长态势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人均水平，都将显著地缩小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到2010年，我国人均收入虽然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但可望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

行列，而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可能位居世界前列。这些预测以及相应的国际比较分析，为我们正确把握下个世纪初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化的态势，提供了一个比较可信的图画。

本书的第四部分是有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研究。这一部分中除了对我国的三次产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预测以外，还对若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行较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篇幅虽然不长，但集中地讨论若干新经济增长点的问题，在目前的著作中尚不多见，其中对我国住宅业的发展和轿车进入家庭的前景所作的分析是很值得重视的。同时，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提法，颇有见地。以往讨论新经济增长点时，多集中于消费品产品产业领域，本书将量大面广的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为新经济增长点，确实言中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很有参考价值。当然，本书对未来 15 年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和预测研究，还有待于全国经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我衷心地渴望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有更多更好的专著问世。

刘国光
1997年9月2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和现状

第一章 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	(1)
第一节 计划机制条件下的产业结构演变.....	(2)
第二节 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条件下的结构演变.....	(10)
第三节 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结构演变	(18)
第四节 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21)
第五节 产业结构演变的若干理论问题	(28)
第二章 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分析	(38)
第一节 80年代以来的经验	(39)
第二节 经济增长源考察	(41)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变化分析	(49)

第二部分 产业结构分析的模型技术

第三章 大道定理与大道模型	(56)
第一节 产业结构的数量表示	(56)
第二节 动态投入产出	(57)
第三节 动态投入产出优化模型	(59)
第四节 对偶问题	(66)
第五节 冯·诺依曼定理	(72)
第六节 大道定理	(77)
第七节 灵敏度分析	(84)
第八节 大道模型	(89)
第四章 影子价格	(91)

第一节	影子价格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91)
第二节	大道模型中的影子价格	(102)
第五章	中国产业结构研究的定量分析模型体系	(109)
第一节	建模原则和原理	(109)
第二节	模型体系的主要内容	(114)
第六章	模型的数据处理	(119)
第一节	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编制及修订	(119)
第二节	投资系数矩阵(B)的编制	(121)
第三节	消费需求矩阵(C)的编制	(128)

第三部分 1991~201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 分析和预测——模型的应用

第七章	1991~2010 年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133)
第八章	1991~2010 年经济结构转变的基本格局	(142)
第九章	基础产业及其瓶颈分析	(153)
第一节	基础产业	(153)
第二节	瓶颈产业分析	(157)
第三节	结论	(168)
第十章	中国的居民消费	(172)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的变化与发展	(172)
第二节	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分析和预测	(177)

第四部分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第十一章	推行产业政策的依据及实施	(189)
第一节	产业政策的概念	(189)
第二节	实行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及理论依据	(192)
第三节	确定主导产业的基本理论	(197)
第四节	中国推行的若干产业政策及新形势下的要点	(202)
第十二章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分析	(209)

第一节	第一产业.....	(209)
第二节	第二产业.....	(222)
第三节	第三产业.....	(232)
第十三章	关于新经济增长点的若干分析.....	(245)
第一节	住宅建设.....	(245)
第二节	轿车工业的发展及轿车进入家庭问题.....	(257)
第三节	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268)

第一部分 中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和现状

第一章 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

有的同志说：“所谓产业结构就是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组成部分的构成和相互关系的总称”^[1]。也有同志说：“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比例构成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联系”^[2]。我们把产业结构分为静态与动态两个概念，前者是指在某个时点上各产业资源配置、转换和产出的构成；后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种构成改变为另一种构成。对产业结构演变的研究可按五年计划或波动周期划分，本章按经济机制划分，在同一机制作用的条件下，分析产业结构在波动周期中的变化。

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和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主要是市场与计划机制同时在发挥作用，本章对此不作分析。1958～1978年产业结构是在计划机制条件下演变的，这段时间我国统计采用物质平衡体系(MPS)，我们将国民收入、投资、劳动力分为农业、工业和其他部门进行分析。1979～1991年产业结构是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条件下演变的，这段时间我国将MPS改成了国民核算体系(SNA)，计算了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我们按三次产业进行分

析。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章对这个阶段前几年产业结构的演变作些分析。在分三个阶段讨论了产业结构的演变之后，我们研究了它存在的问题以及若干理论问题。

第一节 计划机制条件下的产业结构演变

我国从旧中国继承下来的产业结构是非常落后的，1952年农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9%，是一个典型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同年，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64.5%。这就是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起点。面对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决定了经济发展的以下重大问题。

一、战略选择

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当时把工业化比喻为主体，把两种改造比喻为两翼。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先发展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前苏联有过激烈的争论。由于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中国在制定工业化战略时没有出现争论。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就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其中包括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建材工业，它们可以满足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国防和外贸的需要，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前景。

进口替代战略分为低、中、高三级，低中级替代是进口机器设备，在国内生产非耐用品与耐用品，高级替代是进口机器设备，在国内制造中间产品和投资品。优先发展重工业，说明当时中国选择了高级替代战略。

这种战略选择在当时具有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必要性来说，优

先发展重工业可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迅速改变产业结构落后的局面,巩固国防。从可能性来说,中国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有比较丰富的资源,消费品工业有一定基础,有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援助。1953~1959年由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援助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证明高级进口替代战略是成功的,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基础。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对西方又没有打开局面,中国处于被封锁的状态。1960~1978年,中国既不是进口替代,也不是出口替代。

二、计划机制

选择计划机制的原因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公有制经济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计划经济。马克思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劳动”^[4]。列宁认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的工厂”^[5]。虽然1921年根据列宁的意见,前苏联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但把它看成是暂时的退却,几年后就结束了,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第二,完成战略任务的需要。我国工业化以重工业为重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只能选择计划经济,用行政手段把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按计划分配给重工业及其有关部门。这种工业化战略要求建立上面提到的一系列重工业部门,只有计划机制下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上述目标。第三,前苏联与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前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立的计划经济是人民民主国家学习的榜样。毛泽东同志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6]。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的,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经济管理干部掌握了计划经济理论与技术。虽然1956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前苏联的经验,但只是涉及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与方法,不涉及它的本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前苏联的经验与中国根据地的经验属于同一类型,两者一拍即合,只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不够全面系统。

以前计划经济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人民民主政权只能选择计划机制,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它既可以选择计划机制,也可以选择市场机制,还可以选择两种机制相结合的经济模式。

计划机制的主要内容是,计划机构采用行政办法,在部门、地方、企业之间配置资源,指令性计划几乎包揽了国民经济的一切方面。从纵向看,它从中央计划部门开始,经过部门和地区的计划机构,一直插到各个企业,它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均由计划部门决定。从横向来看,它包括生产、分配、物资交换、生产消费、财政、金融、货币、价格、外贸等等。只有两个例外,一是个人消费品基本上采取自由交换的形式,但有许多票证限制;二是农业的主要部分属于集体经济,计划控制的程度较低,但当时的经济理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集体所有制将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计划体制条件下,物资统购统销,资金统收统支,劳动力统一调配,外贸统进统出,工人捧“铁饭碗”,干部坐“铁交椅”,收入平均分配,等等,就成了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

实现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中国工业化以重工业为重点,资金的积累问题就更加突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是:(1)剪刀差,即压低农副产品的价格,抬高工业品的价格。据估计,1949~1979年农业向非农业部门提供了8000亿元资金,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2)低消费,工资很低,剩余价值率很高,把由此积累的资金投入了重工业及其相关部门。(3)高估人民币的币值,有利于机器设备的进口,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压低初级产品的收购价格,对这些部门征收隐蔽的税收。(4)低利率,这有利于重工业获得贷款,实质上是对这些部门的补贴。(5)财政拨款,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都由财政部门无偿拨给重工业及其有关部门。总之,为了实现工业化,政府从各个方面积累资金,投向重工业及其相关部门。

三、经济周期中的结构变动

1. 1958~1966年。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和“大跃进”的口号，同年5月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把发展速度作为它的灵魂，高举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动员9000万人大办钢铁，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使经济发展出现了第一次大起大落，充分表现了计划经济超乎寻常的能量与破坏力。这个时期产业结构的演变见表1-1。

表1-1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结构 %

年 份	国民收入增长率	农 业	工 业	其他部门
1958	22.0	39.36	35.87	24.77
1959	8.2	30.77	43.13	26.10
1960	-1.4	27.21	46.31	26.48
1961	-29.7	43.37	34.64	21.99
1962	-6.5	48.05	32.79	19.16
1963	10.7	44.80	33.70	21.50
1964	16.5	47.08	36.19	16.73
1965	17.0	45.21	36.41	17.38
1966	17.0	43.63	38.21	18.16

表1-1说明工农业比重的变化相反，工业比重上升时，农业比重下降，反之亦然。1960年农业比重降到了这个周期的最低点，工业比重达到了最高点，1962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其他部门（建筑、运输、商业）的比重处于16%~26%之间，1960年达到最高点，1964年处于最低点。

2. 1966~1970年。任何一场运动都有一个从点到面的扩展过程，“文革”也是如此。1966年下半年它已经对经济产生影响，但还不全面，当年国民收入增长17%。从1967年春天“夺权”开始，全国处于全面的“内战”，破坏作用十分严重。这个时期产业结构的变

化见表 1-2。

表 1-2 1966~1970 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结构变化

%

年份	国民收入增长率	农 业	工 业	其他部门
1966	17.0	43.63	38.21	18.16
1967	-7.2	47.28	33.96	18.76
1968	-6.5	50.46	31.73	17.81
1969	19.3	44.65	36.30	19.05
1970	23.3	40.39	40.97	18.64

从表 1-2 可以看出, 1967 年“文革”主要在城市进行, 造成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的产值急剧下降(工业产值下降 15.5%, 建筑业下降 5.2%, 运输业下降 19.7%), 但农业与商业为正增长。1968 年“文革”的影响已经遍及整个国民经济, 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值全部为负增长。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形势,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抓革命, 促生产”的号召, 使 1969~1970 年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强劲的回升。

3. 1970~1978 年。在这九年中, 产业结构发生了以下变化, 详见表 1-3。

表 1-3 1970~1978 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结构变化

%

年份	国民收入增长率	农 业	工 业	其他部门
1970	23.3	40.39	40.97	18.64
1971	7.0	38.90	42.90	17.00
1972	2.9	37.83	44.10	18.07
1973	8.3	38.22	44.00	17.73
1974	1.1	39.27	43.23	17.50
1975	8.3	37.79	46.02	16.19
1976	-2.7	38.73	45.57	15.70
1977	7.8	34.53	47.77	17.70
1978	12.3	32.76	49.40	17.84

在这个期间，随着各地党委和革委会的成立，经济秩序逐步恢复。但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经济增长率时高时低，很不正常。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巨大损失，使全国惊恐不安，许多地方发布了没有科学根据的地震预报，大批职工逃离厂矿，使经济运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负增长。党内的激烈斗争是这年经济滑坡的政治原因。10年“文革”对经济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但当时的领导人对整个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错误地提出了“洋冒进”的口号，使1978年出现了一时的高速增长。

四、资源配置的变化

1958~1978年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拿劳动力来说，1978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比重下降了7.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35%，工业比重上升了6.68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3%，其他部门的比重提高了0.72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03%。这些都是符合规律的变化。我们以这些变化为依据，计算了各产业(部门)的标准结构，用实际结构减去标准结构，得到了它们之间的差额。计算结果表明，1958~1961年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工业和其他部门比重的上升，都大大超过了标准结构，但偏离程度在逐年缩小。1962~1978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超过标准结构，工业和其他部门的比重均低于标准结构，说明这个时期吸取了三年“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对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持非常慎重的态度，通过城市户口、商品粮供应、招工指标和工资控制等政策，对劳动力的流动实行严格限制，甚至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

再看基建投资。1958~1966年农业投资比重的最高点(1963年)与最低点(1958年)相差13.2个百分点；工业投资比重的最高点是1958年，最低点是1965年，相差14.3个百分点；其他部门比重的最高点(1966年)与最低点(1962年)相差13.8个百分点。1967~1978年农业投资比重的最高点是1970年，最低点是1971年，相差2个百分点；工业投资比重的最高点(1977年)与最低点

(1970年)相差5个百分点；其他部门投资比重的最高点是1969年，最低点是1977年，相差4.8个百分点。这说明“文革”期间各部门投资比重变化的幅度比“大跃进”时期小得多。

以上分析说明，“大跃进”时期是用计划机制大规模重新配置资源，造成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在“文革”两个周期中，资源配置虽有变化，但规模不大，表现为生产要素的呆滞。所谓资源呆滞，是指各产业拥有的生产要素，随着政治形势(或其他因素)的变化，其利用程度发生变化。当政治形势比较稳定时，资源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经济增长率较高；当政治形势不稳定，特别是在“停产闹革命”时，资源呆滞程度很高，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

五、计划机制失灵的原因

1956年完成所有制改造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治运动不断，经济发展几起几落，人民付出的劳动与他们得到的实惠存在很大的反差。对这种情况有两种解释：一种意见认为，计划机制本身是好的，但计划工作没有做好。另一种意见认为，计划机制本身存在缺点，需要改革。我们持后一种意见。造成计划机制失灵的主要原因是：

1. 计划属于意识形态，它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如果计划能正确地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它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从理论上讲，计划机制可以集中使用资源，是调整产业结构最有效的办法，能够与市场机制一样，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实践证明，当经济结构十分复杂时，计划经济的决策过于集中，不能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例如，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根据主观意图作出决策，大搞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在“文革”期间，派别林立，搞什么“夺权”，结果武斗不断，全面内战。在这些情况下，即使信息完全，经济建设也会陷于大上大下的不正常状态。

2. 计划机制要发挥正面的作用，需要全面、及时的信息，但用于决策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传递与反馈需要时间，而且会发生

流失和失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信息传递与反馈是按纵向建立的,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较多,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十分落后。企业的供、产、销,人、财、物,所有的经济变量都时刻在发生变化,由于信息传递与反馈的时间太长,滞后是普遍现象,计划机制与信息本质之间发生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它的成本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低。

3. 计划机制要发挥正面的作用,要求部门、地区、单位、个人都没有经济利益,都是机器人,实行程序控制。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他们都是经济人,都有决定其行为的利益。例如,政府部门要求企业完成计划指标,企业就隐瞒生产能力,压低生产任务,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向政府部门争投资,争物资,争资金,争劳动力。企业要求职工完成任务时,职工就压低定额。由此可见,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职工之间都是对策关系,忽视这种深层次的机理,计划机制的失效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计划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机制是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就要求企业从属于行政单位,统收统支,经济核算与自负盈亏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二是银行国有化,由政府控制和分配资金;三是外贸垄断、进出口货物与出口价格由政府规定,由政府设立的外贸公司垄断这项业务。

但是,这三个条件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负效应:在微观经济领域(包括外贸),企业是行政单位的附属品,外无压力,内无动力,一切受行政单位的安排与支配,使企业基本上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不能破产,职工不能失业;企业一切按计划办事,不重视技术进步,消耗高,质量差,经济效益低。在宏观经济方面,由于不了解生产与市场的变化,计划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短缺与积压并存,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由于投资规模不受约束,常常表现出冲动,促使经济超高速增长,当国力不能支撑时,便立即下马,大砍大杀,造成大起大落;在计划

经济的条件下,银行是政府的出纳,对经济运行只能采取行政的直接调控,往往表现为“一刀切”。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定,使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产业结构在新的条件下发生了新的演变。

第二节 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条件下的结构演变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把它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91年,其特点是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作用由小到大,1991年基本上达到了与计划机制平起平坐的地位。第二阶段是1992~2010年,这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其特点是计划机制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国家采用相应的政策间接调控经济的运行。这里先分析第一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化。

一、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

经济体制改革是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系统,让它逐步扩大作用范围,这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两种机制的结合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以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一方,以非全民经济(农业、乡镇企业、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三资”企业)为另一方,这两者的结合;二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在计划管理存在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引入了市场机制。这种结合不仅表现为一系列双轨制,而且是双轨制扩大的过程。例如,国有企业的物资由政府部门供应一部分,企业自己采购一部分;政府部门与企业都制定一部分价格;产品由政府部门分配一部分,企业自销一部分;等等。在一定时期内,这些双轨制有存在的必要,如果物资、价格、销售等全部由政府部门控制,非国有经济就不能存在和发展;如果价格一下全部放开,就会引起高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经济改革的失败。但是,采用双轨制也会引起许